

## “窃火给人”： 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

马鸣

**摘要**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活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1928—1930年间出现了一个译介热潮。鲁迅于1926—1930年间翻译了多部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著述和苏联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到中国的译者之一。以往研究大都认为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旨在为左翼文学运动提供理论指导。本研究以新史料的挖掘、文本细读为基础,通过回顾鲁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与译介过程,力求对鲁迅的翻译动机提出新的解释,并丰富现有翻译史、文学史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活动社会起因的书写。

**关键词** 鲁迅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唯物主义文艺批评 左翼文艺理论

DOI:10.16238/j.cnki.rla.2023.03.004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活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1928—1930年间出现了一次译介热潮。鲁迅于1926—1930年间翻译了多部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著述和苏联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学界对于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活动的基本情况已进行了一些梳理,包括译介时间、译介对象、底本使用情况、译文发表情况等。<sup>①</sup>对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动机的讨论,在一些有关鲁迅思想、创作与翻译的研究中偶有出现,研究者们认为鲁迅是在“革命文学”论争的压力之下被迫翻译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的,<sup>[1](202)</sup>甚至认为鲁迅试图通过译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建设无产阶级艺术理论。<sup>[2](637)</sup>此外,也有学者在一些文学史、翻译史著述中将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作视为“左翼文学十年”(或“左联”时期)的文艺成就予以梳

---

<sup>①</sup> 这些研究包括: Lundburg, Lennart: *Lu Xun as A Translator: Lu Xun'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1903-1936[M], Stockholm University, 1999; 刘少勤: 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 [M],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王友贵: 翻译家鲁迅 [M],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顾均: 鲁迅翻译研究 [M],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

理与讨论。<sup>①</sup>学者们此番解释与操作无异于将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等同于左翼文艺理论的引进,不仅忽略了鲁迅翻译动机的复杂性,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活动社会起因的解读也过于简单。

以往研究对于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解读的深度极大地受到了史料的影响。研究者大都使用二、三手史料,很少挖掘新史料。本研究搜集到了鲁迅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本和相应的日文底本,以及与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相关的文章、信件、日记、书帐等史料。通过对这些新史料的分析,本研究力求还原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的过程,对其翻译动机提出新的解释,并丰富现有文学史、翻译史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活动社会起因的书写。

### 一、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之前和论争期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

在“革命文学”论争之前,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仅限于《革命与文学》中的一个章节。“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鲁迅翻译了一部苏俄文艺政策集——《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本研究分别还原了鲁迅两部译作的翻译过程,揭示鲁迅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接受情况和翻译动机。

#### 1. 《文学与革命》第三章的译介

虽然有学者认为鲁迅是在“革命文

学”论争的压力之下才被迫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但丸山升很早就指出,鲁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注早在“革命文学”论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sup>[3](132)</sup>“十月革命”爆发时,鲁迅就开始关注俄国。到了20年代中期,他开始关注苏联的文学与艺术。

从鲁迅的书帐可以看到,1924年10月开始,鲁迅在北京的东亚公司购买了多部介绍苏俄文学与艺术的著述,如《革命时期的演剧与舞蹈》《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新俄美术大观》等。在这些书中,他尤其看重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1927年9月11日他在广州购买了该书的英译本。1928年2月23日在上海内山书店再次购买了该书的日译本。1928年还曾协助李霁野与韦素园翻译该书,并列为其主编的“未名丛书”之一出版。除了《文学与革命》,鲁迅在京期间还购买了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文化论》《西伯利亚流亡记》等多部著作。托洛茨基的著述影响了鲁迅的文艺观,其在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的杂文和演讲中多次援引托洛茨基的文艺观点。<sup>[4](92-96)</sup>鲁迅受其影响较大的是关于文学与革命关系的论述,但二人的阐释又不完全相同:托洛茨基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鲁迅则认为中国会产生

<sup>①</sup> 这些研究包括: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M],学林出版社,1998;孟昭毅、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毛剑:“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进与发展研究[D],山东大学,2006;谭好哲:《文艺与意识形态》[M],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汪介之:《回望与沉思:苏俄文论在20世纪中国文坛》[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革命文学”，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文学”会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产生。这表明，尽管鲁迅早在“革命文学”论争之前就已经开始接触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但仅限于个别文艺理论家的著述，其接受情况并不机械。

鲁迅购买、阅读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源于其文艺兴趣，那他为何要译介该书呢？事实上，这与中国最早译介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者任国桢有关。任国桢在北大学习期间与鲁迅熟识，曾邀请鲁迅为其翻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校译。鲁迅不仅完成了译稿的校对工作，还亲自为该书写了“前记”。在他看来，苏联文艺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当时的中国并不为所知，因此肯定该书在促进人们了解苏俄文艺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sup>[5](3)</sup>可以推断，鲁迅1926年着手翻译《文学与革命》是为了增加中国文艺界对于苏联文艺成就的了解。“革命文学”论争之前，鲁迅本人阅读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述不多，对于理论发展的脉络不甚了解。1928年春，鲁迅给任国桢写信，希望其能帮忙拟定一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目，作为翻译活动的参考。<sup>[6](61-62)</sup>1928—1929年间，鲁迅集中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所依据的正是任国桢拟定的这份书目。

综上，鲁迅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活动的目的是将苏联在文艺领域的成就介绍到中国，其译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任国桢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启发。

## 2. 《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的译介

1928年1月27日，鲁迅在上海内山书店购买了《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并于1928年5月着手翻译，后以《苏俄的文艺政策》为题连续发表在《奔流》期刊之上。

译介该书时，“革命文学”论争已经开始。此时，鲁迅已了解到托洛茨基被放逐的事实，以及苏联文艺界对于托洛茨基的批判。但同时，鲁迅也通过该书获知“同路人”作家并未受到俄共（布）的排斥，他也因此继续认同托洛茨基关于“同路人”的论述。鲁迅在这一时期翻译了多部苏联“同路人”作家的作品，还在日后“左联”成立大会上公开表达了他对于“同路人”群体的认同，并以这一身份加入了“左联”。<sup>[7](140)</sup>

通过阅读《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鲁迅意识到了中国的“革命文学”论争与1923—1925年间苏联文艺论战之间的理论联系。这引发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进一步探究，但这个过程颇为艰辛。1930年，鲁迅在《文艺政策》的“后记”中讲到：“人往往以神话中的 Prometheus 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sup>[8](4-6)</sup>鲁迅此段文字可以这样理解：首先，鲁迅承认了他本人关于文学与革命

关系的论述曾深受托洛茨基的影响,因此读到《文艺政策》中对托洛茨基文艺思想的批判时,发现很多需要反思或纠正的地方;其次,鲁迅将苏联文艺论战的各种讨论介绍到中国,也是为了回应“批评家们”对其“不懂理论”的攻击。

可以看出,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译介《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一方面是由于卷入“革命文学”论争,希望通过客观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揭露“批评家”们未曾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便匆忙机械套用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向中国文艺界介绍苏联文艺领域的经验。

## 二、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后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

“革命文学”论争后,鲁迅加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力度。1928年,他与冯雪峰一起发起了一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丛——“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集中地介绍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著述,以及苏联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丛书译介与出版计划几经变动,且理论类译著发行量不大,存世译本较为罕见,学界长期以来对该丛书关注较少。事实上,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活动。

丛书收入了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文艺理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和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专著《艺术论》。本研究接下来从鲁迅在上海的文人交往及其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过程两方面,分析这一时期鲁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与翻译动机。

### 1. 冯雪峰与鲁迅的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译介

1928年12月,在柔石的引荐下,冯雪峰与鲁迅初次见面。此后不久,二人就决定发起“科学的艺术论丛书”。

冯雪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范围之广,数量之大,超出了鲁迅与瞿秋白在内的当时所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者。冯雪峰通过自学日语,阅读了一批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著述,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文艺蓬勃发展的态势,为之震撼。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初,冯雪峰翻译了三部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升曙梦介绍苏俄文艺发展的著述——《新俄文学的曙光期》、《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和《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对苏俄的文艺成就有了更深的认识。受国共合作下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影响,他一度表示要力求在中国发展与新社会相适应的“新文艺”。<sup>[9](2)</sup>

1928年初,冯雪峰阅读并翻译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和外村史郎编译的《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同年9月由北新书局以《新俄的文艺政策》为名出版。冯雪峰在该书的序言中谈及了“同路人”作家问题,尤其强调俄共(布)不排斥“同路人”作家的态度。据此,他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站在了鲁迅等作

家的一边,反对“批评家”的“左倾机械论与教条主义”。冯雪峰参照苏联文艺论战经验分析中国“革命文学”论争的作法比较机械,但反映出他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析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这一点上,他与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相似,赞同通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甚至以激进的文学活动推动当时中国低迷的革命形势。

虽然冯雪峰与鲁迅二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情况不同,但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向中国介绍苏俄文艺方面的经验。尤其在经历了“革命文学”论争后,二人均认为中国知识界需要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冯雪峰在连续出版了多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作后,在当时小有名气。与鲁迅相识后,他就主动邀请鲁迅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不久后二人就共同发起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可见,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后加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的力度,与冯雪峰的影响密不可分。

## 2. 鲁迅翻译《文艺与批评》和《艺术论》的过程

译本记录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思考。对于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文及相应底本进行文本细读,可以再现鲁迅的翻译过程,从而揭示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和翻译动机。本研究从鲁迅对于翻译方法的选择、译语的选择,以及译本的加工三个方面还原其翻译过程。

### (1) 翻译方法的选择

《文艺与批评》中收入的《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一文是卢那察尔斯基很具代表性的文艺批评论文。1928年,杉本良吉将其翻译成日文,收入在丛文阁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托尔斯泰》一书中。以该书为底本,鲁迅将《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转译成了中文。本研究将鲁迅的此篇译文与杉本良吉的日文译文进行对比,分析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方法。

经过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层面的对比,本研究发现:首先,鲁迅译文中出现的新名词大多是直接借用日文底本中的日文原词,如“理想主义者”“人类”“进化”“有害”“教义”等。虽然这些日文词在字形上与中文词一致,其含义却与所对应的中文词不尽相同,甚至有一些在中文里并没有明确的意义;其次,在一些短语的翻译上,鲁迅基本按照日文原文的顺序逐字对译,如“神圣的聪明的理想”“自然底经济关系的平凡的真理”“现实的愚劣邪恶的混乱的”,如此复杂的修饰关系在日文中是可以接受的,却不符合中文的语法习惯。而且,鲁迅在翻译长句时也大都采用这种逐字对译的方法,几乎未对句内各成分的顺序进行调整。

鲁迅把自己这种逐字对译的方法称为“硬译”,在这一时期翻译日本和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述时基本都采用这种方法。很多研究者认为鲁迅的“硬译”旨在介绍异质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但由于鲁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作可读性差,且鲁迅所使用的日文底本获得难度大,长期以来少有研究者对其

进行文本细读。翻阅杉本良吉的《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的译文,可见其日文译文质量并不高,很多地方翻译得十分模糊。日本文艺理论家们在翻译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品时,主要依据英文、法文、德文,甚至世界语的底本,中间往往经过多次转译,这对日文译本的质量影响很大。鲁迅也表示,日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底本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其对于这些文艺理论作品的理解与表达。在无法准确理解日文译本时,他只好无奈选择逐字翻译。<sup>[10](4)</sup>

此外,鲁迅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导致其“硬译”的原因——“译者能力”有限,即译者语言能力与专业素养方面的欠缺。多年在日本学习的鲁迅日语能力较好,但杉本良吉在翻译时使用了很多复杂的古日语表达,这对于鲁迅来说有一定难度。另外,一名合格的译者不仅要有很强的双语能力,还要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储备。尽管鲁迅在二三十年代译介的文学作品清晰、流畅,但他在文学上的造诣并不能弥补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修养方面的不足。在《艺术论》的“小序”里,鲁迅就曾谈到自己专业知识匮乏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文的质量。<sup>[11](v)</sup>

在语篇层面上,鲁迅在翻译这篇论文时未对杉本良吉的日文译本进行任何增删,严格按照原文的段落结构完整地翻译了全文,甚至保留了原文中的一些强调符号。可以看出,鲁迅在翻译过程中希望采用直译来处理原文。“革命文学”论争暴露了中国文艺界理论修养不足、滥用理论的事实,因此他希望通过直译,客观、忠

实地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绍到中国。但现实是,由于底本质量、译者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的限制,鲁迅的直译最终无奈沦为了“硬译”,<sup>[12](228)</sup>于是他又提出了“重译”以解决这一问题。

## (2) 译语的选择

鲁迅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述中含有大量的专有名词。这些名词在当时的汉语中对应的译语并未固化。不同的译者依据个人的理解,采用直译、意译、音译等多种方法处理这些专有名词。鲁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有名词译语的选择能反映出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与翻译动机。

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成员对鲁迅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其不懂理论,所以在他们鼓吹“革命文学”的文章中使用了大量的新名词,如“奥伏赫变”、“意德沃罗基”、“印贴利更追亚”等。在“革命文学”倡导者眼里,这些新名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华,是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其中,德语词“*Ideologie*”在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的文章中使用频率极高,曾以“意识形态”“意德沃罗基”和“*Ideologie*”等多种形式出现。从出现频率来看,“批评家”们更倾向于将其译为“意德沃罗基”。

后期创造社成员曾在1928年1月《文化批判》的“新辞源”栏目中对该词专门作出过解释。注释后半部分出现了对“*Ideologie*”社会功能的期待:过去的人以为“*Ideologie*”是“人的精神的内在底发展”,但是“到了现在”,“意识形态的批判”已成为“一种革命的助产生者”。<sup>[13](101)</sup>

虽然“Ideologie”当时的常见译法是“意识形态”和“观念体”，但“批评家”们为了鼓动和扩大文学的功能性，为“革命文学”寻找理论依据，将其改译为“意德沃罗基”。

“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夸大文艺社会功能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影响。虽然辛克莱声称“一切艺术都是宣传”，把艺术看作阶级“袭击的武器”，但他同时也提出艺术是否伟大取决于宣传效果质量的高低：“富有生气而重要的宣传，用适宜的技巧，由所选的艺术发挥出来的时候就是产生了伟大的艺术。”<sup>[14](85)</sup>然而，后期创造社成员对于辛克莱文艺功能观的接受有着很强的选择性，这两点均未被他们提及。他们的表述中只有“一切艺术都是宣传”。

创造社成员在这一时期对于“意德沃罗基”的滥用大有彻底取代“意识形态”之势。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接受了用“意德沃罗基”取代“意识形态”的译法。杜国庠(林柏)这一时期也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译文中使用的都是“意德沃罗基”的译语。

作为文艺理论领域的常见词，“Ideologie”自然也频繁地出现在鲁迅翻译的《文艺政策》《文艺与批评》和《艺术论》等译作中。但鲁迅未使用“意德沃罗基”“ideology”或是“意识形态”的译语，而将其译为“观念形态”。这一方面是因为鲁迅曾明确表示不提倡专有名词的音译，<sup>[15](5)</sup>更重要原因显然与鲁迅对于文学功能的态度有关。

辛克莱的文艺功能观在当时的中国

影响十分广泛，鲁迅也对其大加赞赏。他认为文艺不是能决定成败的武器，但它可以作为宣传的武器，其能否完成宣传的角色还在于它能否坚持自身。<sup>[16](43)</sup>鲁迅对于辛克莱观点的把握更为全面，因此他对于后期创造社成员们将过多的社会功能强加于文学之上的做法十分排斥。在译介“Ideologie”一词的时候，他不仅未使用创造社成员们所推崇的“意德沃罗基”，甚至不采用他们弃用的“意识形态”，而是另辟蹊径地将其译为“观念形态”。除了“意德沃罗基”，“革命文学”倡导者为了凸显文艺的社会功能，还为很多重要专有名词制造了新的译语，如“印贴利更追亚”“布尔乔亚汩”“普罗列塔利亚”等。鲁迅的译文中均未采用这些译语，而是选择了比较常见的“智识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

鲁迅与后期创造社成员对于重要专有名词译语的不同选择体现了他们对于文学社会功能性的不同态度，也揭示了1928—1930年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复杂的接受状况。“革命文学”倡导者对于文艺功能的盲目夸大反映出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理解的“左倾”，而鲁迅这一时期的翻译动机就在于纠正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唯心解读。不难看出，与冯雪峰、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不同，鲁迅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并不是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提供理论指导。

### (3) 译本的加工

在翻译过程中，鲁迅除了用直译的方法力求忠实地翻译了原著，还对《艺术论》

和《文艺与批评》的译本进行了一些加工,如在译作的序、跋内,或另外附加文章介绍原著者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生平及其艺术观。

在翻译《艺术论》时,鲁迅将《露西亚社会民主劳动党史》《卢西亚革命运动史》和《蒲力汗诺夫和艺术》三篇文章杂糅成一篇附在书前,介绍原著者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在《文艺与批评》中,鲁迅翻译了日本人尾濑敬止撰写的《为批评家的卢那察尔斯基》作为前言,介绍该书作者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观。鲁迅介绍二人的生平、文艺思想,目的在于让中国文艺界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此举也反映出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非常有限的客观状况。

值得关注的是,鲁迅在介绍原著者的生平和文艺思想时,尤其强调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身份,及其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文艺的方法。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将马克思主义观点运用于美学和文艺理论领域的第一人,写下了大量的文艺理论著述。虽然未能构建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但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美学和文艺学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所以,普列汉诺夫在二十年代的苏联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领域无可争议的权威。1930年翻译《艺术论》时,鲁迅在该书的“序言”中将普列汉诺夫称为“俄国无产阶级之父”“伟大的思想家”,认为“蒲力汗诺夫也给马克思主义艺术论放下了基础”。<sup>[17](16)</sup>

但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前就去世了,沃罗夫斯基在“十月革命”后则基本停止了文艺理论批评活动。三大批评家中,只有卢那察尔斯基亲身参加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参与了“十月革命”后的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批评。他关于艺术的社会属性、本质和创作原则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鲁迅在《文艺与批评》末尾的“译者附记”中尤其肯定了著者卢那察尔斯基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开展文艺批评的方法。<sup>[10](7)</sup>

鲁迅在译著的序、跋中对于原著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身份的凸显,说明他非常看重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文艺,在“革命文学”论争后试图将一种“科学”的文艺理论引入中国文学界,在中国建立唯物主义文艺批评体系。

## 结 论

回顾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前、论争中和论争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过程,可以看出鲁迅的译介规模逐步扩大,译介内容愈发权威;同时,鲁迅的译介目的也发生了变化:从“革命文学”论争前的介绍苏俄文艺成就,到论争中介绍苏联文艺发展经验,再到论争后的建立唯物主义文艺批评体系。

鲁迅翻译动机的转变是中国知识界对于文艺理论探索的一个缩影。维新变法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西方的科学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国文学界也相应地积极汲取西方的文艺理论,力图融入世界文学之中。进化论是



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明之一,也是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重要内容。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进化论在中国都是“科学”的代名词。“五四”之后,“科学”的概念发生了改变,转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文艺领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取代了进化论,受到了知识分子的关注。鲁迅与冯雪峰发起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丛定名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就可以印证这一点。由此可见,20世纪20年代,鲁迅等译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实际上是延续了“五四”文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西方文艺理论的引进。

鲁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接受仅限于个别文艺理论家的某些观点,且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比较理性的思辨,并未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知识体系全盘接受。他对于文学的功能没有冯雪峰和“革命文学”倡导者那样激进的要求,他不认可激进的文学运动,即便加入“左联”之后也依然持这一态度。所以,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并非旨在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提供理论指导,不应解读为左翼文论的引进。

事实上,在1928—1930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的热潮中,也有很多非左翼文化人的身影。如因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而遭到左翼文坛痛批的杜衡(苏汶),曾在1928年翻译了“无产阶级文化派”代表作家波格丹诺夫的《新艺术论》,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源于其多元且自由的文艺兴趣。又如热衷于描述灯红酒绿大都会生活的“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也于1930年翻译过苏联文

艺理论家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则是为了向中国文坛介绍一种先锋、时髦的新兴文艺理论。

总的来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活动涉及众多不同背景的译者,其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情况有很大差异,翻译动机也多元且复杂。为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提供理论指导而开展的译介只是众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活动的一部分。因此,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以及1928年至1930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热潮不应完全归因于左翼文学运动的发生与发展。

#### 参考文献

- [1] Lee, Leo Ou-fan: *Literary Trends: The Road to Revolution, 1927-1949* [A]// Merle Goldman: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2.
- [2] 增田涉: 忆鲁迅 [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二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5。
- [3] 丸山升: 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 [A], 乐黛云编: 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 [4] 朱正: 鲁迅和《文学与革命》[J]// 现代中文学刊, 2011年第3期。
- [5] 鲁迅: 前记 [A], 任国桢: 苏俄的文艺论战, 北新书局, 1925。
- [6] 蔡清富: 一篇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读楚图南《鲁迅和党的联系之片断》[J]// 鲁迅研究月刊, 2000年第12期。
- [7] 赵歌东: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

- 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J]// 文史哲, 2012 年第 1 期。
- [8] 鲁迅: 后记 [A], [ 俄 ] 俄共布等: 文艺政策, 鲁迅译, 水沫书店, 1930。
- [9] 冯雪峰: 序 [A], [ 日 ] 升曙梦: 新俄文学的曙光期, 画室译, 北新书局, 1927。
- [10] 鲁迅: 译者附记 [A], [ 苏 ] 卢那察尔斯基: 文艺与批评, 鲁迅译, 水沫书店, 1929。
- [11] 鲁迅: 小序 [A], [ 苏 ] 卢那察尔斯基: 艺术论, 鲁迅译, 大江书铺, 1929。
- [12] 马鸣: 再论鲁迅的“硬译”——从苏俄文艺理论《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说起 [J]// 上海鲁迅研究, 2014 年第 1 期。
- [13] 同人: 新辞源 [J]// 文化批判, 1928 年第 1 期。
- [14] [ 美 ] 辛克莱: 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 [J]// 冯乃超译, 文化批判, 1928 年第 2 期。
- [15] 鲁迅: 醉眼中的朦胧 [J]// 语丝(第四卷), 1928 年第 11 期。
- [16] 鲁迅: 文艺与革命 [J]// 语丝(第四卷), 1928 年第 16 期。
- [17] 鲁迅: 序言 [A], [ 俄 ] 蒲力汗诺夫: 艺术论, 鲁迅译, 光华书局, 1930。

### Stealing Fire from God: Lu Xun's Translation of Marxist Theories of Art and Literature

Ma Ming

**Abstract** China's import of Marxist theories of art and literature began from the early 1920s and thrived between 1928 and 1930. As one of the earliest translators of Marxist theories of art and literature, from 1926 to 1930, Lu Xun translated some works by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eorists from Soviet Russia, as well as some policies related to art and literature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Previous researchers interpret Lu Xun'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s import of leftist theories for China's Proletarian Literary Movemen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ain why Lu Xun did those translations by restoring his rece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Marxist theories of art and literature with new archives and by text analysis to his translation works and their source texts. In this way, the causes of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of Marxist theories of art and literature in China in the 1920s could be explored, which may enrich the writings of Chines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Keywords** Lu Xun, Marxist theory of art and literature, materialist literary criticism, leftist theory of art and literature

(作者单位: 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